

● 书 评

一部回应“戏剧危机”问题的力作 ——评《文艺生态运动与当代戏剧》

程 芸

(武汉大学 艺术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程 芸(1972-), 男, 江西景德镇人, 武汉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戏剧戏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7.3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2-0255-02

戏剧艺术是一个民族、国家精神生活最直接、最生动的表现形式之一,然而有着悠久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却不断地遭遇戏剧“困境”、“危机”、“出路”等问题的困扰。不管是剧目创作、舞台演出,还是理论批评,人们都强烈地意识到一个似乎不可逆转的态势的迫近,那就是作为曾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众文艺样式的戏剧,正在逐渐从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变迁的主潮中“淡出”,变得越来越“边缘化”了。置身于这样的大背景,从事戏剧研究、戏剧批评,特别是戏剧现状的批评与研究,就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另一方面,不景气的戏剧现状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戏剧的理论批评如何才能切近艺术实践,如何解决为人们所关注的现实问题?

吴济时先生的《文艺生态运动与当代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出版)正是这样一部回应时代呼唤的著作。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作者“非常明确、具体地感知到文艺领域正在发生一场以生存竞争为突出现象的、强烈的文艺生态运动”,本书主要构想正是“运用文艺生态运动的基本规律,联系戏剧的实际状态,特别是我国当代戏剧发展变易的现状”,对我国戏剧的“危机”、“出路”等问题所作出独具匠心的剖析。

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考察文艺现象,自法国人丹纳的《艺术哲学》以来就逐渐为学者所关注。丹纳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他甚至断言:“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端、缺憾,丹纳的理论依然开拓了无数后来者的思路。近几年来,国内文艺理论界有人正式提出了构建“文艺生态学”学科体系的呼吁,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文艺生态运动与当代戏剧》正问世于这一学术背景。作者在体认和思考强烈的文艺生态运动的种种发展、变易的现象时,“也发现了一些具有规律性的运动状态,它的运动状态有独特性,与生物界生态运动的规律是不完全相同的”。在对文艺生态环境作出大、中、小区分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不少别会有会心、值得我们重视的见解。例如,他认为:生物生态是一种“自在的状态”,而文艺生态则是“一种人为的情态”,生物界遵循“物竞天择”、自然淘汰,文艺生态则必须强调“人择”、社会淘汰;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规律,对于文艺生态而言却不尽然,“劣”的不一定都被“汰”掉;“人的审美价值观既受到文艺生态环境的影响,又是文艺生态运动的直接动力。正是这种作用与反作用形成的运转,构成为文艺生态的小环境”;“文艺生态运动中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都不是生搬硬套,而是经过本身独特性选择和消化,进行适合自己需要的再创造。”凡此种种,都体现了一位老文艺工作者、研究者较为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及可贵的理论创新的勇气,其立论前提、分析问题的视角

虽出于一己之心得,但因为有充实的事实依据,故亦足以学界构建“文艺生态学”学科体系的努力提供一定的启示。

当然,本书的主要用意并不是理论体系的建构,而是回应现状、解决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在全面考察20世纪文艺生态运动新动向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当代中国的戏剧“危机”问题作出回应。作者既有着丰富戏剧实践经验,又从事了多年高校教学和研究工作,因此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他既能保持一个研究者必要的冷静、理智乃至前瞻性的洞察力,也能避免某些学者由于对演艺实践的隔膜而造成的这样或那样的空疏、片面乃至极端。

本书的视野是相当开阔的。作者注意到欧美各国的戏剧艺术也曾受到影视文化的强势冲击,也有过困难与危机,本书详细分析、讨论了国外艺术家的经验,然后为解决当代中国戏剧如何在影视文化大潮中求得生存权、发展权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例如,他明确提倡:“戏剧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大力张扬独特性”,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戏剧的所谓“影视化”;他提出:“不反传统不行,全部抛弃传统没有出路”,当代戏曲的主要问题是“批判继承传统缺乏应有的力度,传统中那些消极、落后的东西还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戏曲改革家还戴着枷锁跳舞,该反的东西没有真正反掉”;又主张:“走近群众,才能走出困境”,戏剧既要“他救”更要“自救”。以上见解其立论平实、朴素,其例证具体、生动,既关注文本创作的美学分析,更重视舞台经验的理性总结,既开出了“药方”,更提供了启迪人们的思路,不放言肆谈,不故作惊人之语,体现了良好的学风与文风,也是作者几十年戏剧实践和研究的重要心得。

与某些谈“当代戏剧”的学者往往将研究对象局限于话剧或戏曲不一样,作者既考察了新时期话剧“在文艺生态环境巨变中的曲折发展”,也论及了“戏曲‘推陈出新’与‘危机’中的新探索”,更别有慧眼地对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歌剧”的发展历程作了较为深刻、全面的总结与反思。作者肯定了新时期话剧文学注重人物内心世界深沉探索的“内向化”趋向,精辟地指出,这一趋向是“把对社会生活所做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深刻剖析统一于戏剧美学的高层次追求”;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戏曲危机问题的解决可能更困难,也更迫切,作者认为:“提高戏曲剧本文学水平,对戏曲战胜‘危机’更显重要”,这一论断简明扼要、鞭辟入里,值得广大文艺工作者重视;新时期以来新歌剧的发展不尽如人意,甚至很难说超越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对这一现象作者也有自己独特的解释,他认为:“新歌剧发展的艰难,关键在于在文艺生态环境中,很难对新歌剧有个科学、明确的定位”,“在新歌剧中存在着追求大、洋、‘高雅’,还是着力于大众化、民族化的摇摆”,这些“构成了新歌剧发展十分缓慢,高质量的成功之作屈指可数的基本原因。”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阅读吴济时先生的《文艺生态运动与当代戏剧》,我们同样能深切地感受到著者“为时”“为事”而作的拳拳之心。一方面,它为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生态学学科提供了一份具体、生动的答卷,而另一方面,它考察当代戏剧“危机”问题时所体现出的时代感、使命感更足以催人奋进。正如著名戏剧理论家郭汉城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肯定的,该书“从理论上回答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艺术宿命论思想,回答了把文艺截然分为先进的与落后的、先进者必然取代落后者的杜撰的竞争规律,回答了否定古老的民族艺术的生命力存在于文艺生态活的机制之中、从而否定‘推陈出新’的各种论调,也回答了打着‘出新’的旗号,违反艺术规律、否定艺术特点、照抄照搬、乱拼乱凑等等做法和说法,为我国戏剧艺术的现代化和民族化扫除了思想障碍。”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研究者能继续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弘扬本书所体现的一个基本学术精神,即“理论联系实际”,共同推进学术的创新和戏剧事业的繁荣。